

中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研究

贵州商学院 林洁

摘要:当前,在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目标的全面推进下,各国经济关系深入发展并日趋紧密,经济全球化形式不断加强,为推进资产的优化配置和跨国经济的布局,中国企业也加快了“走出去”的步伐,尤其针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急剧上升,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,投资中的风险不可规避。针对此,本文将对中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特点为切入点,分析其存在的政治、经济及投资自带风险,进而寻求应对策略,实现直接投资的更大范围延伸。

关键词: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 直接投资 政治风险

中图分类号: F752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2096-0298(2017)09(c)-074-02

“一带一路”是中国与世界互动发展的新战略,其是在和平发展旗帜下,通过政治合作、经济融合等来谋求与沿线国家的共赢发展,该战略目标的提出,推进了我国与沿线各国之间全面的、紧密的合作,在这一发展框架下各国的投资环境得以深度优化,中国针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数量和规模日趋上升,其为各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生动力,并成为支撑其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快速增长的有效力量,同时,通过直接投资也加快了沿线各个能源、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,有效激发了地区合作的乘法效应,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深远意义。然而,这其中也伴随着相应的政治、经济等风险,如何规避风险,实现直接投资的优化配置成为了“一带一路”发展中的关键问题,而本文将以此为研究基点,针对投资现状,分析存在的风险,从而探寻有效的解决路径,以进一步推进直接投资。

1 中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特点

1.1 地区分布特点

“一带一路”经济带跨越欧亚大陆、西太平洋、印度洋,辐射64个国家,近年来,随着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加速推进,中国对于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力度和规模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,首先,从国家分布来看,其直接投资排在前十名的国家依次为新加坡、俄罗斯、印度尼西亚、老挝、阿联酋、巴基斯坦、印度、蒙古等,根据数据统计,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在沿线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已到达73.26%,由此可知,中国对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直接投资的国家分布比较集中,多数都为紧邻我国的邻国,地理位置上的便利、经济互动的频繁性,有效带动了直接投资的数量。其次,从区域分布上看,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依据地理位置不同可分为俄蒙、中亚、中东欧、西亚中东、南亚、东南亚6个不同区域,而针对中国对这些地

数农业旅游开发仍处于根据农作物生长期组织旅游,受农业季节性制约严重;缺乏有效的管理和专门的人才,等。

4 体验营销的实际运用

4.1 体验营销在农业中的应用——以湖北土老憨生态农业集团为例

湖北土老憨生态农业集团总部位于湖北省宜都市,2005年成立。以土老憨和清江野渔为两大主打品牌,形成柑橘全产业链加工、野鱼深加工的产业链。为转变发展方式,带动当地橘农增收,土老憨集团积极探寻新出路,将体验营销应用于柑橘农业中,实现其可持续发展。

4.2 就土老憨集团在柑橘农业中应用体验营销进行优势分析

该公司以柑橘农业种植为基础,以精细化加工为支撑,以旅游开发为带动,探索新农村建设原地城镇化、农业产业化、农村休闲游、农业新技术普及、新品种应用、“互联网+五位一体”相结合的发展模式,推进建设国家柑橘农业公园,从而促进三产业融合发展,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;建设“一村、一品、一文化”格局,实现农村休闲体验旅游业与柑桔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,发展富有地方特色的柑橘文化体验式旅游服务业;打造优质品牌,优化柑橘原材料生产基地建设,提升土老憨全产业链品牌影响力;与中国农业大学、华中农业大学、西南大学、台湾中华海洋大学、武汉工业学院、湖北工业学院等高校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,并引入优良品种采取现代技术使其“四季不断桔”,冲破农业季节性限制;与意大利专家保罗

教授进行友好交流,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成为集团顾问,并且积极吸取大学生人才,为企业注入新鲜血液。

5 结语

5.1 研究结论

体验营销应用于农业。一方面满足了城里人渴望宁静、释放压力的体验需求,顺应了精神消费日益多元化的潮流;另一方面,农业通过旅游发展从幕后走向人们的视野,有益于农民收入的提高,增长农村地区经济,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。因此,在农业中的运用体验营销有着广阔的市场。

5.2 展望

体验营销在农业中的应用逐渐成熟且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。由此看来,体验营销在农业中的应用将会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探索新的出路,带来新的活力。对于体验营销在农业中的应用将进行持续的探索,未来也将变得更加完善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B.H.schmiett,experiential;How to Get Customers To Sense,Feel,Think,Act and Ralate to Company and Brands[M].New york:The Free Press,1999.
- [2] 戴美琪,游碧竹.国内休闲农业旅游发展研究[J].湘潭大学学报,2006(4).

区的直接投资规模大小可分为四个梯队,东南亚为投资增长速度最大,10年增长了100倍,俄蒙、西亚中东区为第二梯队,南亚及中亚地区为第三梯队,直接投资增长潜力较大且是未来的主要着力点,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是中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国,已然上升为第4大投资来源国,中东欧地区为第四梯队,因为地理位置偏远,且受德法俄的控制,中国对中东欧的直接投资额度所占比较小,仅为沿线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2.35%。

1.2 行业分布特点

中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呈现多元发展态势,以2005年为临界点,之前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产业领域,而在2005年之后,直接投资的范围深化拓展,逐渐延伸至金融、科技、交通、农业、石油矿石等领域,但此阶段能源仍然占主导地位,而紧随其后的为石油矿石、不动产及交通运输行业,而至2015年,中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才发生根本性转变,金融、商业服务及租赁等新型产业的直接投资比重直线上升,能源产业不再是主导。而且因为各沿线国家资源禀赋、经济发展水平及各方优势的不同,这些都影响了中国直接投资的行业偏向,诸如东南亚的矿产、石油、天然气资源丰富,则直接投资就集中在金属矿石资源开发、石油天然气开采、电力等能源行业,而中亚地区的油气资源丰富,轻工业发展滞后,则中国对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集中在石油开采、交通运输及物流交通上,而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,中国对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度较小,且集中在机械制造、能源开采、基础设施建设等几个特定的领域,有待进一步延伸投资覆盖范围。

1.3 投资主体特点

依据投资形式的不同,中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主要为金融类及非金融类投资,投资主体为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,国有企业在工程技术、资金力量、专业团队等方面的优势,使其成为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,仅2016年,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分别为420.590亿元,占比为38.9%、45.3%左右,且非国有企业多为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东部发达地区,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非国有企业的直接投资额则相对较低,而相比之下,金融类直接投资额的投资主体较为集中,主要被四大国有银行代表的国有金融企业所垄断,非国有金融企业在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少,根据数据统计,截至2016年底,国有金融机构对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量为41亿美元。

2 中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主要风险

2.1 政治风险

政治关系的稳定性是确保投资效益的关键所在,“一带一路”所覆盖的多为发展中国家,许多处于地缘政治冲突频繁发生的地带,政权更替频繁、民族冲突及恐怖主义充斥其中,政治环境较为混乱,如东南亚地区的缅甸、越南、柬埔寨等存在较大的政治不稳定性,中亚地区为多民族和部族的集聚地,民族及宗教冲突较为严重,吉尔吉斯斯坦不仅国内政局较为动荡,时常发生暴动,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矛盾也比较紧张,而且“一带一路”经济带是恐怖势力盘踞的主要区域,尤其“西亚中东—南亚—中亚”已经形成了弧形分布的恐怖主义地带,恐怖袭击及暴乱时有发生,对沿线各国的政治稳定、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,更直接影响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。而且,东道国的政策变动也是政治风

险之一,许多东道国以公共利益、环境保护为理由随意变更投资政策,以此遏制外国的直接投资,叫停投资项目或直接国有化投资财产,直接损害外国投资者的正当财产权益。同时,为了争夺沿线国家丰富的资源,拓展其势力范围,美国提出“亚太再平衡”、日本也在积极推进对沿线国家的基建投资,以此挤压中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,打破了稳定的经济投资环境,容易产生大国博弈风险。

2.2 经济风险

“一带一路”沿线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并不完善,较为脆弱,不良贷款占比较高、汇率波动大,加之各国的社会及经济体制差异较大,许多国家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,经济制度尚不健全,贸易保护严重,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就对进出口贸易进行了严格的限制,仅仅审批程序就需要十多个文件,完成直接投资的各项审批就需要耗费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,而且,出于不同的政治、经济等目的,许多国家将中国视为贸易竞争对手,经常性地对中国发起反倾销、反补贴调查,这从根本上抑制了中国的直接投资,根据数据显示,印度是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中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诉讼最频繁的国家,从2000年~2016年,印度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诉讼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,平均增长速度为12.5%,在此影响下,中国对印度的直接投资额也在逐渐递减。

2.3 其他风险

根据上述中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特点可知,其投资国家、区域、行业较为集中,且投资主体主要为国有企业,这种相对集中的投资特点,增加了投资的政治、经济风险性,一旦沿线国家政权更替、政局发生动荡或是民族冲突、恐怖主义严重,则很可能造成直接投资的巨大损失甚至是被他国国有化,不仅侵害了投资者的正当财产权益,而且影响了中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热情和积极性,从根本上抑制直接投资规模,同时,直接投资的主体主要为国有企业,非国有企业因为工程技术、资金力量、专业人才等方面的短板,没有足够的实力进行国外投资,也无法应对各国繁琐的贸易审批程序及反倾销反补贴的诉讼,由此,直接投资的风险多数均集中在了国有企业之上,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国家金融稳定与安全。

3 结语

随着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深入推进,投资市场的空间格局得以延伸和拓展,中国对于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不断上升,但是收益与风险是企业投资决策的主要考量因素,政治、经济、行业及地区风险的存在,会对直接投资造成负面影响,甚至会危及国家金融及经济安全,因此,深入分析各类风险,对于规避不合理投资行为、确保国家金融安全和提升投资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苏馨.中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研究[D].吉林大学,2017.
- [2] 崔娜,柳春,胡春田.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效率、投资风险与东道国制度——来自“一带一路”沿线投资的经验证据[J].山西财经大学学报,2017,39(04).
- [3] 郭玉梅.中国对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[D].东北财经大学,2016.
- [4] 李坤.中国对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研究[D].湖北大学,2016.